

文思集叢

周善才 著

蓝天出版社

文思集叢

李超



周善才 著

蓝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思集丛 / 周善才著.—北京:蓝天出版社,2008.9

ISBN 978-7-5094-0048-7

I.文… II.周… III.①军队建设-中国-文集②军队-干部-素质-中国-文集③军队政治工作-中国-文集
IV.E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130116号

出版发行: 蓝天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复兴路 14 号

邮 编: 100843

电 话: 66983835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中煤彩印厂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: 290 千字

印 张: 12

插 页: 8

印 数: 1—5000 册

版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6.00 元



1974 年 10 月，北京天安门。



1978 年 10 月，上海复旦大学。



1988 年 5 月，在空军大院家中。

1992 年 12 月，参加全国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，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记者采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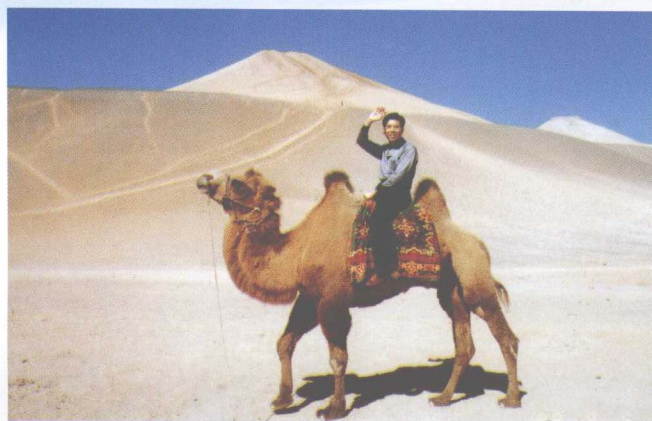




2000年10月，内蒙古
阿拉善盟胡杨林前。



2000年10月，酒泉卫星
发射塔前。



1999年8月，新疆
吐鲁番火焰山下。



2001年8月，率空政歌舞团文艺小分队赴甘巴拉雷达站慰问演出。

2001年11月，在广州观摩全国第九届运动会。



2001年8月，率空政歌舞团、话剧团赴驻藏部队慰问演出。



出席空军2000年世界各国驻华大使武官迎新春招待会。

2000年4月，
香港维多利亚海
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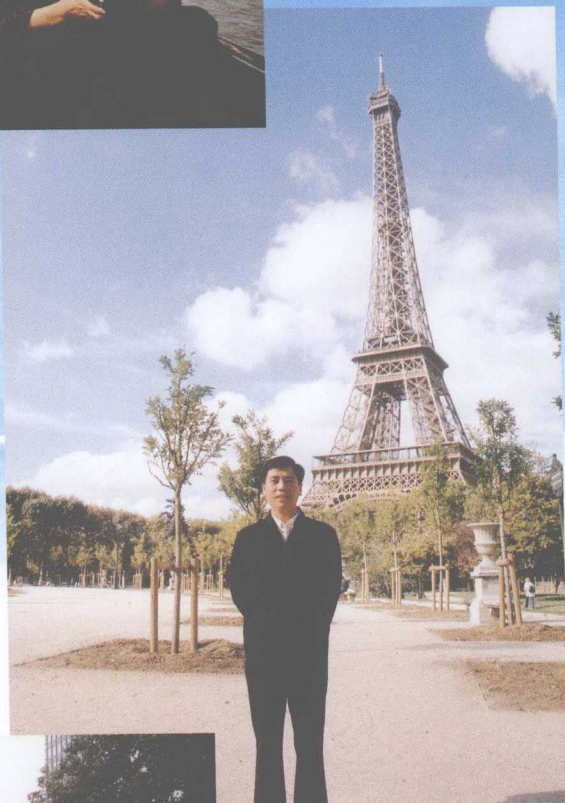


2000年6月，率
空军女子篮球队访问韩
国时，在我驻韩大使馆
楼前。



2001年10月，
意大利水城威尼斯。

2001年10月，法国
巴黎埃菲尔铁塔。



2001年9月，德国
柏林。



2002 年 12 月，陪同空军政委邓昌友等领导同志视察空军指挥学院保定分院。

2003 年 9 月，
在空军指挥学院保
定分院干部大会
上。



2004 年 7 月，华北明珠
白洋淀。



新世纪之初，北京
钓鱼台国宾馆。



2008年5月，延安。



2008年7月，在空军指挥学院为科研部、军事理论研究所的机关干部和
部分研究人员讲写作课。



2002年夏，全家在上海黄浦江畔。



2007年9月，女儿周谧在英国贝特福德大学毕业典礼上。

2007年
12月，女儿
周谧在意大利
米兰。



自序

马克思说,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。作为个人,当回首凝望自己每个时期各个阶段“足迹”的时候,就会看到留在身后的那一页又一页定格的历史;当跨越时空,回顾人生,再去品味熟悉的人和经历的事的时候,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、认识这个世界,而且还能进一步领略人生的哲理。应当说,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,既经过了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全面振兴的年代,又享受了改革开放带来的丰硕成果,还正在经历着世界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、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兴起和新军事变革的伟大时代。作为中华儿女、炎黄子孙,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变革、大发展的年代,成长在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、大熔炉里,我为此感到骄傲,常常引以为荣。

—

1954年12月9日,我出生在江西省南康市(原南康县)凤岗镇一个小山村的农民家庭。家乡山青水秀,人杰地灵,赣州新机场就坐落在距我家1500多米的地方。

我出生时,与叔叔、伯伯的儿子家共住在一个有天井的大瓦

房里。我家背靠一座山,门前有两口池塘。曾祖父周性连是晚清时当地的秀才。父母一生以农为业。父亲周积养,为人忠厚,胸襟开阔,办事利落。虽然识字不多,干农活却是一把好手。他一生坎坷,在战乱年代,吃了很多苦,磨砺出坚强的意志。在最困难的时候,是父亲支撑着这个家,养育了哥哥周善奎、姐姐周福英和我。母亲蓝金秀,心地善良,勤劳朴实,性情温和,待人热情。她虽然没有什么文化,但对子女要求却非常严格,上学不准迟到早退,不准要别人的东西,有空要参加家里的劳动。给我记忆最深的是,她经常起早贪黑去地里干活,我小时候也经常跟她到田园地头,遇到乡亲都热情地打招呼;在别人遇到困难时,总是慷慨解囊,只要家里有的东西,都毫不犹豫地拿出来帮助别人。

在上世纪60年代初,由于父母开荒种地,勤劳节俭,治家有方,盖起了一栋大小5间的瓦房,成为当地的一道亮丽风景。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母亲在盖房过程中,因病去世,那年我才8岁。母亲去世,给家庭生活带来很大困难,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,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。幼年失去母亲和艰苦的生活,使我从小养成了勤劳、朴实、正直和奋发自强的性格,也培养了我独立生活的能力和工作泼辣的作风。在小时候的艰苦生活中,得到姑姑、叔叔以及堂兄周善普的许多关照。

我6岁步入校门,小学是在凤岗镇燕山和龙江小学读的,中学是在凤岗中学读的。上中学时,尽管受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影响,由于自己没有放松学习,在动乱的年代也学到了不少科学文化知识。回想在中小学读书的生活,许多师长特别是几位老师,像罗定湘、吴益民、刘淑娇等,是永远不会忘怀的。他们不仅给我传授了知识,而且教我学会了做人;不仅严格要求我,而且关心帮助我,他们良好的师德师风一直影响着我。

1970年秋天,一些工厂在家乡招工;与此同时,北京军区空

军也来征兵。在这个人生的“十字路口”上,我毫不犹豫地放弃当工人的机会,执意报名参军。

母亲去世后,是奶奶带我长大的,和奶奶有着深厚的感情。奶奶是旧社会过来的人,没有文化,思想观念也比较老旧。有一天,奶奶看到征兵的解放军来家访,心里有些“恐惧”和着急,她把我叫到旁边说:“‘好男不当兵,好铁不打钉’,你千万不要去当兵。”我跟她作了许多解释,告诉她现在和旧社会不一样了,新中国是“好男去当兵,好铁才打钉”。她看到我态度坚决,只好默然表示理解。父亲了解我的心思,他很支持我当兵,认为年轻人要到外面闯一闯,部队是个锻炼人的好地方。12月初,奶奶因病去世,病重期间我一直陪伴在她身边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处理完奶奶的丧事几天后,我就接到了入伍通知书。

12月18日,我身穿绿军装,胸戴大红花,在亲人和同学、同乡的簇拥下,在一片锣鼓声、鞭炮声中告别父老乡亲,登上解放牌卡车前往县城。在县政府招待所住了一天,又乘车前往韶关,转火车直达北京。一路上,火车开开停停,而坐在车厢里的新兵,有的吃着家里带来的鸡蛋和花生,有的还唱着《红灯记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的曲调,个个兴高采烈。特别是在火车经过南京长江大桥时,大家更是心潮澎湃。到了北方,火车在那一望无际的平原上飞奔疾驶。望着窗外,看到了一些从未见过的景物:一队队马车拉着重物在路上缓缓前行,一群群绵羊在田野里悠闲地吃草;一幢幢用土坯砌成的小平房,一片片树林和果园……一切都是那么新奇,那么令人神往。23日深夜到达北京,在火车站等了两个多小时才天亮。在兵站吃过早饭后,接兵的同志带我们到天安门照相留念,随后就乘车到了廊坊新兵中转站,进行短暂的休息和体检。1971年1月上旬,我被分到北空某地空导弹兵部队,开始了正规的军旅生活。

二

我们部队驻在河北省某县的一个果林里,遍地是苹果树、梨树和枣树,伸手可摘梨,张嘴可吃枣,周围大多是西瓜地,吃水果非常方便。新兵分到部队后,经过两个多月紧张而又严格的训练,初步完成了从一个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。新兵训练结束后,我被分配到指挥连无线班当报务员,在团部集训了4个月。训练期间,教员耿红军对我要求非常严格,在训练上,给予了特殊的指导;生活上,给予了兄弟般的关照。由于我学习认真、训练刻苦,收发报技术提高很快,业余时间还经常帮助集训队做好事,入伍两个多月就加入了共青团组织。遗憾的是由于工作变动,与耿教员失去联系,至今不知他在何方。在训练中,我和山东蓬莱入伍的战士郝传峻(现山东烟台市旅游局副局长),经常在一起切磋训练方法和技术,我们互相学习、互相关心、互相帮助,成为亲密战友。集训结束回连队后,由于在集训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,很快就担负了战备任务。从此,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,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学政治、学理论、学技术,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,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

后来连队成立理论小组时,我被吸收为理论小组成员,负责辅导连队干部战士的理论学习,有时也给全营的干部战士上理论课。有一次,刘明廷教导员叫我给全营辅导一下《共产党宣言》,我把这本书找来反复学了几遍,又看了一些有关辅导材料,综合自己的学习体会,就给全营干部战士“上课”去了。讲完后,没有想到,营首长和连指导员还有其他同志都说我讲得不错。从此,我就对理论学习和研究产生了兴趣。由于我爱写写画画,1972年,连队在改选军人委员会和团支部时,我被选为军人委员

会和团支部的宣传委员。为了搞好连队的宣传和学习,我经常学习工作到深夜,每星期坚持出两期黑板报,大项政治教育时还随时出墙报。后来又创办了连队快报,每天出一期,宣传连队当天的好人好事,这对于调动干部战士的练兵积极性,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,促进连队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1973年至1974年,新兵到连队后,领导确定我负责新兵标图员训练。为了把训练搞好,我不仅认真组织,严格要求,严格训练,而且不断改进训练方法,及时掌握他们的思想情况,解决训练中遇到的问题,使新兵提前一个多月担负了战备任务,多次受到营连领导的表扬和团训练部门的肯定,并总结推广了我组织训练的经验。当战士期间,我先后两次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。1973年8月,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74年5月,被提升为干部。当时指挥排没有干部编制,组织上让我到雷达排当了几个月雷达操纵员,与同乡好友袁乐忠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。3个月 after,组织正式任命我为操纵长。命令刚下达,就被调去北京军区空军参加学习,学习回来就留在团政治处理论组工作。同年8月,被任命为团政治处书记。

在团政治处任书记期间,我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团里的一些对外事务,配合副主任搞好行政管理工作,有时随领导和工作组下部队调查、蹲点和搞教育。特别是跟团长蔺传族、政委王克瑞、王恒远,副政委于海涛下部队调查研究、检查工作,受益匪浅。向他们学到了许多好思想、好品德,以及认识问题、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思路。政治处主任张华友、副主任李德华对我非常信任,经常放手让我独立处理问题、起草文件。在实践中,我的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有了提高,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大为增强,较快地适应了团政治处的工作。特别是跟首长下部队,起草首长讲话稿,唐山大地震后到北京慰问部队家属,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,到内

蒙古办理部队家属子女调动手续，以及处理政治处内部事务等工作完成较好，领导满意。1976年7月，团党委推荐我上大学。

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的第一个春天，1977年2月，我经推荐和考试，跨入了上海复旦大学的校门，在哲学系读书学习。这时学校已逐步走向正轨，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，为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刚步入大学生活时，一切都感到新奇，一切都有极大的吸引力。特别是进了图书馆，就像扑入知识的海洋，我每天晚饭后和节假日都要到图书馆看书学习，查阅各种资料，复习老师讲的课程。在大学3年的学习时间里，我各门课程考试都在优良以上。毕业论文《试论张载对辩证法思想的历史贡献》发表在《复旦大学学报》上。在写论文期间，因图书馆晚上10点关门，我便找哲学系一位同乡邓刚忠老师借了一个教师阅览证。从图书馆出来后，就到教师阅览室继续学习和查阅资料，经常到深夜十一二点，有时更晚。有意思的是，同寝室的同学都以为我在谈恋爱。后来我的论文发表了，他们才知道我是在加班加点地学习、写作。在我写论文的过程中，得到了中国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、复旦大学著名教授潘富恩的有力指导。我的论文写完送他看后，潘教授非常兴奋，当即批语：“此文有独到见解，文字顺畅，观点准确，建议发表。”为了使我的论文在毕业之前能发表出来，他把自己在《复旦大学学报》已排好版的稿子撤下来，让我的先发。他这种无私的精神和对学生真诚的关爱之情令我感动万分，至今难以忘怀。大学生活是我世界观形成和知识积累的重要时期，也是我人生中最舒心、最快乐的年代。每天早上起床后，就到操场或树林里读背英语。上午、下午上课，有时自习。下午5点到篮、排球场打球或跑步锻炼身体。吃过晚饭后，7点就到图书馆看书。星期天有时去书店购书，有时和同学到郊区呼吸新鲜空气，有时骑自行车逛上海的大街小巷。寒、暑假有时去勤工俭学，有时和